

第一章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

在中世纪曾经出过一些成绩卓著的编年史家，如弗赖辛的鄂图 和 马泰·帕里斯、 儒安微尔 和 弗·鲁瓦萨尔。这些人就他们那个时代留下的史料是相当可靠的，但当时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印刷术还无人知道，因而书籍稀少。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评价还没有开始，人们也未认识到有这种需要。虔诚的编年史家们置身修道院的图书宝藏内，怡然自得，他们从不停下来对文献的价值加以考虑，而把过去史料中的错误也一起抄到他们的著作中去了。当时，伪造典章之风很盛，但揭穿贗品的方法却还没有发明。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下来，而人们由于承认传统，就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了。最后一点，中世纪的空气弥漫着浓厚的神学味道。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一千年之中几乎像是一种物质力量，压在欧洲人的心头，使他们无法注意世俗历史及其问题。由于一切都被归之于神意，因此对自然因果关系的探索也就被看作完全不必要，如果不算是僭越的话。这样，历史成了布道，而不是一门科学，成了对基督的验证，而不是设法客观地追溯和解释文明的进程。

对人类的展望，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起了很大变化，这种转变有利于客观的方法和历史的发生学概念之兴起。古典世界被揭示为光彩夺目的实体而不是朦胧不明的传说，这样就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深思。而人们的探究精神又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同东方建立进一步密切关系而得到更大的鼓舞。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空间的范围与知识的眼界都加倍地扩大了。随着知识疆界的向前扩展，在学术气氛方面，也开始发生了几乎同样重要的变化。

教会的日益腐朽、城市生活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大本已开始对神学精神起着溶解的作用，而异教文化——它是又崇高又那么坦率地合乎人情——的引

弗赖辛的鄂图（约公元 1114—1158 年），弗赖辛的主教，中世纪德意志著名史学家，著有《编年史》、《腓特烈皇帝本纪》传世。——谭注

马泰·帕里斯（约 1200—1259 年），英国史学家，著有《大编年史》。——谭注

儒安微尔（1224—1319 年），法国史学家，著有以第七次十字军为背景的《圣路易传》。——谭注

弗·鲁瓦萨尔（约公元 1337—约 1410 年）法国史学家，曾任英国宫廷史官，著有《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记其当代之事。采遗闻佚事及文笔优美见长。——谭注

评述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的最佳作品有：傅埃脱的《近代史学史》，（1911 年），第三版，（1936 年）；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卷 1，（1942 年）（纽约）；莫里茨·里特尔，《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 年）；和弗里茨·瓦格纳，《历史科学》，（1951 年）。在研究文艺复兴以来德国史学方面，韦格勒著《德国史学史》（1883 年），迈涅克著《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 年）和斯尔比克著《从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直到今日的思想与史学》（1950 年），是必读之物。为了研究文艺复兴以来的法国史学，弗林特，《法国与比利时的历史哲学》（1893 年）和莫诺，《法国历史研究的进步》，载〔法国〕《历史评论》，卷 1，是有用的资料。在近代史方面，集体创作的《五十年来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876—1926 年》，二卷，（1928 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特别是其中有关小国家方面。——原注

奥古斯丁（354—430 年），基督教神学家，神学历史观的代表人物。在其所著《上帝之城》中指出人类一切活动无不出于上帝的安排，体现上帝的计划。他把世界历史说成是“上帝的城”，即上帝的信徒与“人世之城”即撒旦的信徒之间斗争的过程，认定后者注定要毁灭，前者则将永生。并指出教会是上帝的代表，因此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教会应当成为世界的主宰。这部书创立了关于社会历史的神学理论体系。——谭注

诱又加速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所以，与其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对权威的有意识的反抗，不如说它是一个思想世俗化的运动。对于人，对于人的智力和人体美的引以自豪的喜悦心理，取代了中世纪理想中的忧郁的禁欲主义。对人类在世间的成就的研究，取代了对人的精神特质和死后情景的臆测。以奥古斯丁作为开端的中世纪时代，随着马基雅维里与拉伯雷，哥伦布与哥白尼的出现而告终了。

这种新精神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内也获得了反映。这门新学科的最早的大师，佩脱拉克与薄伽丘，是近代历史学之父。然而，他们仅仅是业余研究者，而佛罗伦萨人布鲁尼才是史学家的完美典范，他是在原则上使用批判方法的第一个历史家。为了达到尽量摹拟古典作品的目标，布鲁尼和他的人文主义朋友不得不做死板的摹仿工作，不过，他们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步骤，也就不可能取得以自然因果关系代替超自然因果关系的进步。当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使历史学超脱文学的领域，并把它同国家生活联系起来以后，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传统不再像是向人们发布命令，而像是在进行挑战了。洛伦佐·瓦拉证明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是伪造的；而人文主义的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也从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精神来对待奇迹和神话。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迅速传遍欧洲。学者们像群星一样照耀着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他本人就是一个历史家）的宫廷，激起了人们对条顿族的英雄和成就的兴趣。凯尔蒂斯讲授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库斯比尼安编辑乔丹斯和弗赖辛的鄂图的著作。波伊廷格尔与勒纳努斯潜心于德意志古文化的研究。这些学者给中欧引进了研究世俗学识的理想与方法和公平正直的学术风气。

歌特在宣称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文化倒退了一百年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正是这批人，因为德国人文主义的短暂历程是由于路德的出现而被粗暴地截断的。于是，神学再度占据统治地位，而世俗研究也就被淹没在教派斗争的漩涡里。但是，这场热症本身也就包藏着治疗它的细菌。中世纪的争论者们

拉伯雷，F.（约1494—1553年），著名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谭注

布鲁尼（1359—1444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十二卷，首先恢复了古希腊罗马史学的优良传统，用理性来分析和考察历史。——谭注

圭恰迪尼（1483—1540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意大利史》。——谭注
“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是一个教会文件，文中说教皇的领土系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所赠与。意大利学者瓦拉（1406—1457年）著文，用缜密的考证方法，作出了这一文件纯属伪造的结论。——谭注

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1405—1464年）德意志人，史学家，著有《欧洲通史》、《巴塞尔会议评注》等。——谭注

参阅约阿希姆森（Joachimsen），《德国在人文主义影响下的历史概念》，1910年。——原注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1483—1540年），爱好学术，奖掖文艺，在宫廷内罗致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学术文化极一时之盛。——谭注

凯尔蒂斯，C.（1459—1508年），德意志史学家，恢复和出版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谭注

库斯比尼安（1473—1529），德意志学者，对鄂图的著作及乔丹斯（6世纪修士）所作的卡西奥多罗斯（约480—575年）《哥特史提要》进行了整理和考订。——谭注

波伊廷格尔，C.（1465—1547年），德意志史学家，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德意志中世纪史原始资料。——谭注

勒纳努斯，B.（1486—1547年），德意志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德意志事务史》。——谭注

都诉诸原则，而他们的后继者则诉诸史实。新教教徒力图证明美第奇族教皇的教会已不是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并设法说明教会是怎样地日趋堕落。另一方面，天主教徒则企图用揭示新教徒所不知道的事实，使他们惊惶失措。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双方追求的目的都是胜利，而不是真理，但是，珍贵的文献却因此而见了天日。当弗拉希和他的合作者在路德派王公的支持下，以《马德堡世纪》作为武器来攻击敌人时，罗马教廷命令巴罗尼准备一部详尽的答辩，并以梵蒂冈档案供他随意使用。虽然巴罗尼的这座“大厦”，象卡佐邦后来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子，虽然这部驳复的作者不懂希腊文，天真地轻信了伪品和传说，但他所使用的大量新资料和他的答辩的表面完整性使得这部《编年史》的发表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虽然到了13世纪教派斗争的毒害逐渐消退，但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宗教性的。属于英国国教派的卓越神学家，从厄谢尔到宾厄姆所编写的关于早期教会的著作，是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处于罗马和日内瓦两着之间的地位，能够对争论的问题作出不偏不倚的论断。比利时的耶稣会徒在巴兰与帕珀布罗赫的领导下，开始编辑《圣徒传》，规模如此宏大，以致迄今还在进行。法国所做的贡献更加伟大。高卢神学家对教皇极权派所肯定的东西进行了细致而严格的研究；詹森教派的蒂尔蒙搜集资料，编写了关于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具有无限价值的著作；巴吕兹探索了（被囚于）亚威农的教皇的历史。最重要的，圣穆尔的本尼迪特教派开始出版大部头的丛书，阐明了有关宗教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领域。这些学者生活在一个仍由抽象的笛卡儿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对历史不闻不问，公众对历史也还不感兴趣，因此，在整个学术史中没有一页能比记载着这些伟大学者辛勤

弗拉希（Flacius，1520—1575年），为德国新教教派学者，马丁·路德的学生。《马德堡世纪》，1559—1574年出版，是由几个作者合写的，其中以弗拉希为主，是第一部从新教观点编写的教会史。——译者

卡佐邦（1559—1614年），法国人文主义者，温和的胡格诺派，曾著文驳斥巴罗尼书。——谭注

《编年史》（Annals），全名为《从基督诞生到1198年的宗教编年史》（Annalseclesiastici a Christo nato ad annum 1198年），1580—1593年出版。系巴罗尼（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1538—1607年）对《马德堡世纪》所作的答辩。——译者

参阅帕蒂森（Mark Pattison），《艾萨克·卡佐邦传》第六章，1875年。——原注

厄谢尔，J.（1581—1658年），英国大主教、神学家，以研究《圣经》年代学及英国教会史知名。宾厄姆，J.（1668—1723年），英国神学家、史学家，著有《基督教古迹》十卷。——谭注

帕珀布罗赫，是协助巴兰编辑《圣徒传》的神学家。——谭注

参阅德勒海伊（Delehaye），《巴兰派的工作；1615—1915年》，1922年。——原注

高卢教派，系起于17世纪后期法国天主教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维护本国教会一定独立性的教派。——谭注

荷兰人詹森（Cornelius Jansen，1585—1638年）所创立的天主教会内的改革派。——谭注

蒂尔蒙（1613—1698年），撰有《公元最初六世纪教史札记》，共四卷，《罗马皇帝和统治教会的其它君主最初六世纪历史》共十六卷，以资料丰富见长。——谭注

巴吕兹，E.（1630—1718年）编著有《亚威农教皇史》、《法兰克诸王诏令集》。——谭注

受麦尼厄尔在其有关马比荣与蒙福孔的著作（1888年和1891年）中对本尼迪特派学者作了极佳的叙述。——原注本尼迪特派修道院保存有大量中世纪文献，并进行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史料的工作。此派于1619年创立圣穆尔僧团。这个僧团以圣泽曼修道院为中心，以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谭注

劳动的篇章更为辉煌的了。所以，我们不能指摘那个从巴罗尼开始，以马比荣 达到高峰的一世纪为停滞不前的时期。

虽然 16 和 17 世纪历史学家的题材主要是基督教，但世俗性的题目也吸引着个别研究者的注意，这些人大多数是俗人。皮图 与帕基埃 探索法国制度的起源；杜孔日 绘制拜占庭帝国的很少为人知道的版图；戴尔贝洛 概述当时所积累的有关东方的知识，而梅泽雷 则以宪政主义者的批判精神编写了法国的历史。马利安那 为他的同胞撰述西班牙民族史，而苏里塔 则编写了阿拉贡的编年史。在意大利，西戈尼在努力弄清罗马的机构和制度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成绩。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编写亨利七世的传记，赫伯特勋爵 撰述亨利八世的生平；卡姆登 研究英国的古迹，而塞尔登（11）则溯述法律的历史。在德国，康林（12）指导关于德意志法律起源的深入探究。但在荷兰，世俗性研究涉及的范围却是最广泛的。斯卡利吉尔 在发表他那为科学编年史奠基的不朽论述之前，已在荷兰定居很久了。格吕特尔 的铭文集是在他的督导下编成的；莱顿大学教授们所编关于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也是继承了他的传统的。

在确定历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的少数尝试中，博丹 的论述是一个大胆而

让·马比荣（1632—1707 年），本尼迪特派修士，法国博学派的杰出代表，治学严谨，具有批判精神。著有《本尼迪特圣徒传》、《本尼迪特年鉴》等。其《论古文书学》一书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基础。——谭注

皮图，P.（1539—1596 年），法国博学派史学家，著有《法兰克年代记》，并整理和校订了许多历史资料和著作。——谭注

帕基埃，E.（1529—1615 年），法国律师，著有《法兰西研究》。——谭注

杜孔日（1610—1688 年），编有《中世纪拉丁词汇》、《拜占庭历史家著作汇编》等，被认为是中世纪拉丁语言学和拜占庭学的奠基人。——谭注

戴尔贝洛，B.（1625—1695 年），法国东方学家。——谭注

梅泽雷（1610—1683 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写成《法国史》三卷。——谭注

马利安那，J.（1535—1625 年），西班牙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西班牙史》。——谭注

苏里塔，J.（1512—1580 年），阿拉贡王国史官，撰有《阿拉贡王国编年史》。——谭注

西戈尼（1524—1548 年），以用批判态度研究古罗马历史、制度及文献而知名。——谭注

赫伯特勋爵，E.（1583—1648 年），政治家，哲学家，著有《亨利八世的生平及其统治》一书。——谭注

卡姆登，W.（1551—1623 年），著有《大不列颠志》、《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格兰、爱尔兰史》。——谭注（11）塞尔登，J.（1584—1645 年），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研究英国的法律和政府，写有多种专著。——谭注（12）康林，H.（1606—1681 年），所著《德意志法律起源之史的探讨》被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谭注

斯卡利吉尔，J.J.（1540—1609 年），定居荷兰的法国人文主义者学者，致力于古史和《圣经》年代的研究，对当时已知的纪年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总结，使年代学摆脱宗教史家的体系，为近代的年代学奠定了基础。——谭注

格吕特尔，Jan.（1560—1627 年），古典学家，辑有《古罗马古文物铭文集》。——谭注

博丹，J.J.（1530—1596 年），法国卓越的历史哲学家，第一个用哲学观点来考察历史。著有《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他认为历史是一有秩序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他将人类史，按照其中心地区分为东方、地中海沿岸及北欧三个阶段，强调地理条件对历史运动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观点对后代思想家有很大的影响。——谭注

又辉煌的成就。这位法国政论家，在宗教战争最炽烈的时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世俗性的课题，并以科学精神来研究它。

博丹在孟德斯鸠之前指出了地理位置、气候和土壤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位作家的个人地位、爱国的和宗教的倾向性以及求知机会对他的见解和成就的影响。在他以前，没有一位思想家对于环境所起的作用有过这样深刻的见解，而且在他以后的二百年中也没有人添加什么新的东西。此外，在历史评论的领域里，人们也获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这些成绩还只是一种开端，而不能算是确定的成就。斯宾诺莎宣称，对待《旧约全书》必须象对待任何其他历史著作那样。当西门神父开始运用批判方法来对待犹太教的经文时，曾惹起博絮埃的暴怒。劳诺瓦由于无情地处理殉道者的记录而招来“圣徒的捣巢人”的称号。佩里佐尼厄斯提出，早期罗马史近似传奇。尤其重要的，马比荣以其《古文书学》（1681年出版）奠定了拉丁古文书科学的基础。

到了18世纪，历史研究的领域迅速扩大了。研究者们不断地进行搜集资料的工作；研究者对权威与传统采取了更多的批判态度；最早用文学体裁叙述的历史编写出来了；而对于文明现象，也第一次认真地企图作出解释。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这四个方面来看一看18世纪的作品吧。

在学识的积累方面，法国本尼迪特派保持了他们在17世纪所建立的优越地位。鲁伊那尔仔细审查了早期殉道者的记录；蒙福孔奠定了希腊古文学与古典考古学的基础；布凯汇集了有关法国历史家的作品；克莱芒在其《年代考证法》里，编辑了最早的收罗广泛的历史编年表；圣马尔泰撰述了基督教高卢诸省的历史；韦塞特和德维克编辑了朗格多克编年史；里韦特开始了那部至今仍在继续编写的巨著：《法国文学史》。这批学者，当他们四周的一切正在变化的时候，还在安静地进行研究，自得其乐，直到法国大革命把他们扫除为止。穆拉托里以搜集意大利历史资料、编辑意大利编年史和

斯宾诺莎，B.（1632—1677年），杰出的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 and 无神论者。对《圣经·旧约》进行过批判性研究，认为《创世记》非一人一时之作，《摩西五经》非摩西所作。——谭注

劳诺瓦，L.J.（1603—1678年），法国神学家，教会史家。——谭注

佩里佐尼厄斯，真名 Voorbroek，J.（1651—1751年），荷兰古典语言学家，考据学家，批判地研究早期罗马史料，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谭注

鲁伊那尔，D.T.（1657—1709年），穆尔僧团教士，编有有关殉道者的原始资料集。——谭注

蒙福孔，B.（1655—1741年），穆尔僧团教士，有名的博学派学者，编著有《希腊古文字学》、《古迹图解》（十五册）等。——谭注

布凯，D.M.（1685—1749年），主编《高卢及法兰西历史家选集》，一卷。后人续编至大革命前完成，共十四卷。——谭注

克莱芒，F.（1714—1793年），法国年代学家。——谭注

圣马尔泰（1572—1650年），法国年代学家、历史学家。——谭注

朗格多克，在法国南部有本尼迪特派修道院，所修之《朗格多克通史》五卷，1730—1745年出版。后代学者续事增修，自1843年开始至1905年出齐，共十六卷。——谭注

由里韦特开始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系一多卷本集体著作。自1733年开始出版至1949年出齐共三十八卷，此书不仅是文学史而且是史料集。——谭注

穆拉托里，L.A.（1672—1751年），意大利杰出的博党派史学家，编著有《500—1500年的意大利历史家》共二十五卷，《意大利中世纪文物》，《意大利编年史》等。——谭注

论述意大利古文物的艰巨工作而获得了同马比荣并列的地位。至于蒂拉博斯基所编的意大利文学史，直到现在不但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而且也没有能与之接近的。在德国，莱布尼茨搜集布伦斯威克家族的早期记录并开始撰写《圭尔夫派的起源》，这部书在其死后很久才告完成。奥地利耶稣会徒埃克尔毕生致力于古币的搜集和分类工作。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期的英国，沃顿和斯特赖普、赫恩和马多克斯、希克斯、赖默和威尔金斯继承了坦纳与达格代尔的传统，使得人们有可能搞清楚中世纪的历史。这些人的渊博学识从来没有人能够超越，而他们的著作也依然是严肃的研究者必须经常向之求教的学问宝库。

虽然这些大搜集家们很少使用批判的方法来验证他们的资料，可是学者们却开始更自由地鉴别史料与传统了。在18世纪的前夕，本特利已揭穿《法勒里斯的书信》的伪造性。而在18世纪里，阿斯特律克已发现《创世记》的混合性；赖马鲁斯与塞姆勒始创了对《福音书》的评论性讨论，而维科则对荷马诗篇的协调性提出了怀疑。法国铭文与文学学院成员撰稿编成的《论文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辩论，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关于罗马早期记录的可靠程度的长期讨论，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项讨论是1722年由普伊利首倡的。他大胆宣布，在皮洛士的著述出现前的罗马史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蒂拉博斯基，G.（1731—1794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博学派学者。——谭注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有名的德意志哲学家，兼治历史。他的历史著作《布伦斯威克家族史》原拟叙述这一家族的始末，后来扩大范围，写成了帝国西部，特别是巴伐利亚和萨克逊的圭尔夫派史，只完成了第一卷。——谭注

埃克尔（1737—1798年），奥古币学家，近代古币学的创立者，著有《古币论》，共八卷。——谭注

沃顿，H.（1664—1694年），英国教会史学家；斯特赖普，J.（1643—1737年），撰有《英国宗教改革编年史》；赫恩，T.（1678—1735年），文献学家；马多克斯，T.（1666—1727年），撰有《国库的历史与文物》；希克斯，G.（1612—1715年），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学、历史学奠基人之一；赖默，T.（1641—1713年），曾任王家史官，编辑出版了多种古文献；威尔金斯，D.（1685—1745年），英国中世纪史学家。——谭注

坦纳，T.（1674—1735年），英国主教，以搜集史料，编撰历史家词典而知名。达格代尔，W.（1625—1685年），英国贵族，长期致力于历史考古与史料搜集工作。——谭注

道格拉斯的出色著作：《英国学者》，1939年，描写了从1660年到1730年的伟大资料搜集家。——原注

法勒里斯（约公元前570—554年），西西里岛上阿格里琴托（Agrigento）城的暴君，以极端残暴著名。英国古典学家本特利，R.（1662—1742年）在他的《法勒里斯的书信》中揭出，有一百四十八封有他署名的书信是伪制的。——译者

阿斯特律克，J.（1684—1766年），法国医生，圣经学家。——谭注

赖马鲁斯，H.S.（1694—1766年），德意志古典学家；塞姆勒，J.S.（1725—1791年），德意志神学家。——谭注

维科，G.B.（1668—1744年），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是西方第一个把人类历史看作有规律的过程，并予以系统论证的历史哲学家。对民俗、宗教、神话、语言、文学等均有深刻的研究，认为《荷马史诗》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古希腊人长时期的集体的创作。所著《新科学》为传世名篇。——谭注

参阅穆利著《古老的铭文与文学学院》，1864年。——原注

普伊利，L.（1691—1750年），法国史学家，首先怀疑早期罗马史学家的作品，认为恢复共和以前的罗马史真相是不可能的。——谭注

修道院长萨利埃觉察到这种看法对宗教的危险性，因而诽谤普伊利，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弗雷雷 出来充当调人，他提出，真情往往是与神话混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个问题，博福尔作了一番独立的探讨；他关于早期罗马史之不确实性的著作，证实了普伊利的结论，并预示了后来尼布尔的论点。铭文与文学学院对形成批判方法的贡献，决不仅限于这些辩论。学院的杰出的秘书弗雷雷把一切古文化包括于其研究领域内，因此他的编年表超出了斯卡利吉尔和佩塔微 的研究范围，而分析了希腊神话的来源。同时，他对东方语言的研究也值得他怀疑印欧系诸种族间的血缘关系。梯叶里宣称：“ 如果他能享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自由，关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起源的科学一定会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产生了。” 在 18 世纪的后半期，由于赫鸠雷尼阿古城 的部分的发掘的推动，学院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考古学方面，因而德布罗斯与巴泰勒尔密在温克尔曼 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即已从意大利带回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批判性的历史研究，由于那种使 18 世纪获得“ 理性主义时代 ” 称号的学术风气大转变而得到助益。17 世纪曾偶尔出现怀疑主义思潮，但由于担心受到当世的惩罚而没有发展起来。在 18 世纪初叶，曾经有一股冷风刮过欧洲，而在它的中期，启蒙运动却又是旭日当空了。在丰特内尔在世的时期内，法国即已从博絮埃的天下转移到伏尔泰的时代，从波特—罗雅尔派得势转变为百科全书派盛行了。于是，对现行制度和传统信仰的批判互相影响着。培尔 始倡了以怀疑眼光看待史料和传统的风尚，然而对过去的一切采取崭新态度的，则主要是伏尔泰。培尔是怀疑主义者，而伏尔泰是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真心维护理性的威力和尊严的人才能推翻权威的沉重压力。所以尽管伏尔泰在学问和道德方面有其缺欠，他在那些为历史科学铺平道路的重要人物中仍应享有崇高的地位。伏尔泰以其犀利的智慧，驰骋于迄未受到批判精神挑战的广阔领域，沉重地打击了盲目轻信的风气，而打击盲目轻信之风，仅凭博学是无能为力的。

在 17 世纪出现了一些有高度价值的著作，它们或者涉及到作者亲身经历

皮洛士(公元前 319—272 年)，伊皮罗斯王，曾与意大利希腊殖民地联合对抗罗马，最后为罗马人击败。

——谭注

弗雷雷，N. (1688—1749 年)，法国古典学家、年代学家。——谭注

博福尔，L. (死于 1795 年)，法国史学家。他从有关早期罗马史诸记载的歧异，推论公元前 3 世纪以前的罗马史是以传说资料为依据，因而是不可信从的。——谭注

佩塔微，D. (1583—1652 年)，法国神学家、年代学家。——谭注

赫鸠雷尼阿，在那不勒斯湾附近，公元 79 年威苏维火山爆发与庞培城同时被埋没。1738 年以来，法国古典学家德布罗斯，巴泰勒尔密等，先后进行发掘，发现希腊古庙及珍贵文物甚多。——谭注

温克尔曼，J.J. (1717—1768 年)，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所著《古代艺术史》二卷(1764 年)对古典世界研究及文化史有很大的影响。1758 年温克尔曼由德意志前住意大利进行考古调查。——谭注

丰特内尔 (Fontenelle, 1657—1757 年)，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他以理性作为反对宗教权威和封建统治的武器，提倡科学实验精神，肯定人类社会运动的进步性，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之一。——谭注

培尔，P. (1647—1706 年)，法国史学家，持怀疑主义历史观点，认为史学家当时的观点与所记的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对从《李维罗马史》到教会历史提出了批判。所著《历史批判词典》对西方史学颇有影响。——谭注

的事件，或者讲的是他们那个时代前不久的时期。这些作者是：萨尔皮 和帕拉维奇尼、达维拉、多比涅和德图、克拉伦敦和伯内特、霍夫特和普芬多夫。到了 18 世纪，休谟编写了一部文字精练的英国史；罗伯逊 撰写了一部虽不流畅易读，但更具有学术性的苏格兰史。埃诺 所编的法国编年简史在西斯蒙第的著作出现前一直是法国人向之吸取营养的知识宝库。马斯科夫记述了德国人的命运；约翰内斯·缪勒写下了瑞士各州的史诗；施勒策尔叙述了斯拉夫欧洲的历史；普特尔阐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切拉里抛弃了关于五帝国史的史家传统体系，这种体系曾阻碍文明发展的合理概念的形成。一批不知名的英国作家编成了一部详尽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虽缺少文学的价值，但汇集了大量不易获得的资料；而这部史书（以译本和缩本的形式留传）保持了它的独特地位，直到差不多一百年之后罗特克与施洛塞尔的著作方取而代之为止。尤其重要的，吉本的著作 在古代世界与近代世界之

萨尔皮，P.（1552—1623 年），威尼斯教士，有开明思想，反对教皇专制，著有《特兰托宗教会议史》，对教廷及教会黑暗，所多揭露。后被逐出教会，并被暗杀。帕拉维奇尼，S.（1607—1667 年），枢机主教，著《特兰托宗教会议史》反驳萨尔皮书。——谭注

达维拉，G.G.（1577—1658 年），著有《传道文集》，记天主教士在美洲土著中布道及印第安人宗教信仰情况。多比涅，M.（1794—1872 年），法国新教徒，撰有《欧洲宗教改革史》、《法国宗教改革史》等书。德图，A.（1553—1617 年），法国人文主义者，其历史观念、仍受神学史观支配，倾向于调和新旧教矛盾，著有《我们时代的历史》等。——谭注

克拉伦敦伯爵，名海德，E.（1608—1674 年），英国王党贵族，著有《英国大叛乱史》攻击革命。伯内特，G.（1643—1715 年），英国国教牧师，奥伦治·威廉的亲信，著有《我这个时代的历史》，赞扬“光荣革命”。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早期的托利派和辉格派史学观点。

霍夫特，P.C.（1581—1647 年），荷兰人文主义者，诗人、戏剧家、历史家。译塔西佗史学著作作为荷兰文，著有《十六世纪前半叶荷兰史》、《亨利四世本纪》、《美第奇家族史》等。普芬多夫，S.（1632—1694 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著有《欧洲主要强国历史导论》、《瑞典史》及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大选侯腓特烈、威廉等人传记。——谭注

休谟，D.（1711—1776 年），著名的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著有《自凯撒入侵至 1688 年革命的英国史》共六卷，持托利派史学观点。——谭注。

罗伯逊，W.（1721—1793 年），英国理性主义史学家，著有《苏格兰史》、《查理五世皇帝统治时期史》等。——谭注

埃诺，G.（1685—1770 年），法国史学家，著有《法国编年史纲要》，是法国第一部简明通史。——谭注

马斯科夫，J.J.（1689—1761 年），德意志史学家，著有《古代日耳曼人史》，记自古代至墨洛温朝欧洲日耳曼人的生活、风习、政治、历史情况。——谭注

约翰内斯·缪勒（1752—1809 年），德意志史学家，所著《瑞士联邦史》是其代表作。——谭注

施勒策尔，A.L.（1735—1809 年），德国理性主义史学家，戈廷根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俄国史》、《北欧通史》等。——谭注

普特尔，J.S.（1725—1807 年），德意志史学家，以研究德意志公法及帝国政治制度史知名。——谭注

切拉里（Cellarius，C.1634—1717 年），荷兰人文主义者，钻研年代学，第一次摒弃了教会史学沿袭的“五帝国”（亚述、巴比伦—米太—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罗马—神圣罗马帝国）历史分期法，将世界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为后来西方史学分期之所本。——校者

书名《世界史：从最早著录的时代至当代》，（1736—1765 年）。——谭注

罗特克，K.V.（1775—1840 年），有自由思想的德国史学家，著有《世界史》。施洛塞尔，F.C.（1776—1861

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它迄今仍是各民族的通衢大道；并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建筑物都久已变成废墟之后，仍然屹立着。

虽然国家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但人类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开始吸引学者们注意。第一部总括性的教会史是由莫斯海姆在戈丁根大学的平静气氛里编成的。艺术是文明的产物与镜子；这个观点在温克尔曼笔下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论述，歌特称他是一位新的哥伦布。莫泽尔在其《奥斯那布吕克史》里，最先运用了社会学研究法；赫德尔说他以德意志人的思想与情感编写了第一部德意志人的历史。尤其重要的，伏尔泰创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文化史”的新的类型。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第一幅描绘一个文明国家的多种生活形式的图画。他在几年后，写的《论风俗》(Essai sur les Moeurs)描述了从查理大帝起到路易十三时代止欧洲的道德、社会、经济、艺术与文学生活。他宣称，他的主题是人类思想的历史。他要追述从中世纪的野蛮时期到他那个时代的文明社会所经过的各个阶段，以阐明启蒙运动和社会教养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文笔既华丽，处理方法又新颖，两者加起来使得他这部比18世纪所有其他著作都更能扩大历史研究眼界的书籍流传得越来越广。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尽管有极其明显的缺点，却标志着真正的进步。它结束了那个单纯汇编史料的时代。它把历史的范围从记录事件扩大到论述文明。它企图把批判的标准和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的领域。

最后，在18世纪，在用哲学来解释人类生活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培根的格言“古代时期是少年世界”中所包含的有关进步的概念，后来由巴斯卡予以发展；后者说：必须把在时代演变的整个过程中世代相传的人类看作是一个永远生存，不断学习的人那样。佩罗在关于古代人与近代人的论战

年)，德国自由主义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十九卷，系未完成之作。——谭注

吉本，E. (1737—1794年)，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有启蒙思想的史学家，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世界史学的辉煌巨著。——谭注

关于吉本，参阅伯里的《罗马衰亡史》导论，1896年；扬(G.M.Young)，《论吉本》，1948年。由D.M.洛所编辑的《吉本的日记》(1929年)可以用作吉本所著《自传与通信集》(1896年)的补充读物。——原注

莫斯海姆，J.L. (1693—1735年)，新教神学家，戈丁根大学首任校长，以专治教会史知名。著有《教会史原理》二卷。——谭注

莫泽尔，J. (1720—1794年)，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德意志史学家，其代表作《奥斯那布吕克史》写的是德意志西部一个地区的历史，被认为是第一部德意志人民史，第一部社会经济史和宪政史。——谭注

赫德尔，J.G. (1774—1803年)，德意志启蒙思想家，对哲学、历史、语言学、文艺理论均有研究，试图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探讨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他的思想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很有影响。——谭注

此书的全名是：《论世界历史，及各民族之风俗与精神：自查理大帝至当代》，共七卷，1756年。——谭注

参阅德尔瓦耶的巨著：《论进步观念的历史》1910年；伯里，《进步的观念》，1920年；和卡希勒，《启蒙运动的哲学》，1932年。——原注

巴斯卡，B. (1623—1662年)，法国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谭注

佩罗(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年)，法国作家在他的诗篇《路易十四的时代》中附带表示了贬低古典著作之意，引起布瓦洛(Boileau)和佩罗之间关于古人与今人的价值历时十二年之久的论战。在这方面佩罗著有《古人与今人的比较》。——译者

里主张，我们不但应该称颂古典世界的成绩，而且应该把我们后来学到的一切增添进去，使之臻于完善。他巧妙地比喻说，中世纪时代〔文明〕的中断只是表面现象，就象一条大河在地下流了一段路程那样。丰特内尔认为：虽然一个民族象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各个阶段，但它不会衰退。他的科学研究确实启示了他：在人类历史的运动和“掌握整个自然界的伟大而普遍的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人类可臻于完善境地的理论，正适应了当时新产生的对人类的热情，在整个18世纪，从初期的修道院长圣皮埃尔直到末期的戈德温、孔多塞和“开明派”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热情。

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乐观希望的表达，而不是经过哲学思考而推断出来的结论。在莱布尼茨发表他的进化论之前，不可能有理性史观。我们在莱布尼茨的《新论文集》里读到：“任何事情不是突然而来的；自然界的运动也从来不是跳跃式的。我把这个叫作延续法则。以我们自己为起点，向下看，一直看到最低级的动物，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是一系列延续着的，互相之间差距很小的东西，比如有翅的鱼类、同植物很近似的动物，还有，似乎具有某些人类理性的动物。”自然界是小步前进的，人类同样也是在缓慢而又艰难地向前移动。孤独的那不勒斯思想家维科，在他的《新科学》里讨论变化的法则时，把历史演变过程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最初有森林，后来有了茅舍，然后有村庄，然后有城市，最后才有学院。”这个原则由杜阁在巴黎大学（索蓬）关于人类智慧的不断进步的演讲里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用极其完备的语句宣称，历史是人类通过衰落与复兴永远前进的过程，每个时代同先行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同样都是互相联系着的，蒂尔戈走在孔德之前，业已提出人类思想在对现实的逐步理解中要经过三个状态的法则。进步的意义，决不会局限于人类本性的逐步演进与提高，而是物质财富、精神开化与美德三方面的共同进步。库然称杜阁是历史哲学的创始人；的确再没有比他更应获得这个称号的了。将近18世纪的末期，德国人又为进步论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莱辛在他的晚年，象是从高耸的了望塔上俯视了历史的全景，把他的印象记在他的《人类的教育》内的意味深长的格言里。他宣称：人类智慧本身的力量比影响并形成它的任何一种力量都更加强大。宗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启示，而各种宗教则是人类在进步过程中所使用的课本，每一种宗教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对人类有助益，但没有一种是登峰造极

圣皮埃尔深信历史的进步性，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优于柏拉图的时代，并寄希望于明智的政府来引导社会前进。——谭注

戈德温，W.（1756—1836年），英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理性主义思想家、史学家。——谭注

孔多塞，J.A.（1743—1794年），法国思想家，坚持理性主义和社会进步思想。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将引导人类进入文明幸福的历史时期。——谭注

1776年由威斯豪普特（A.Weishaupt）发起的会社，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使人类与社会达到完善地步。——译者

此书的全名是：《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年）。——谭注

参阅H.P.亚当斯，《维科传》，1935年。——原注

杜阁，A.R.J.（1727—1781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对社会历史运动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谭注

孔德，A.（1798—1857年），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始人。——谭注

指神学状态、形而上学状态与实证状态。——译者

莱辛，G.E.（1729—1781年），德意志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谭注

的。这是没有巴斯卡神学体系的巴斯卡思想。但在研究进步的条件与性质方面，最详尽的论著要算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的观念》一书。赫尔德因为深深感受到宇宙因素的影响，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界中存在着类似的法则。在本世纪末期，伯克在其《关于法国革命感想》一书中宣称，历史生活是有机的延续，而每个时代都受到它先行时代的恩惠。

人们除了探讨历史进步的性质外，还认真地试图解释构成文明的各种具体因素。孟德斯鸠本身是一位法学家，他研究了法律与制度的起源和影响，认为不能按照抽象的原则来评定法律和制度，而必须看它们是否适合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对历史发展中经济因素的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休谟在其《论文集》中已概括出某些有启发性的社会学的理论。但是，把国家的盛衰同经济资源和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则应归功于亚当·斯密。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马尔萨斯根据周密的历史归纳法，创立了人口法则。

尽管在18世纪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完成了卓越而又有持久价值的著作，但仍然存在若干不利于真正的历史科学成长的障碍。第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不利于历史感的形成。在17世纪，对神学的热忱已逐步下降；博絮埃的《世界史》可以看作是神学时代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但历史在世俗化以后，它的历程中出现了新的和同样严重的危险。人们崇拜抽象与绝对的准则；看不到不同时代的不同气氛和观点；热衷于政治与哲学的宣传，这一切都妨害了耐心的研究和客观的探索，只有少数个别思想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观念。当时更为流行的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的行动应是有意识的行动）和自然法则论（以原始社会为理想），都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傲然蔑视过去，就象在睡梦中摆脱了压在身上的梦魇那样。所以，这个时代的趋势鼓励作家满足于肤浅的探究和轻率的概括性论断。波林勃洛克提倡为了有益于政治而研究近代史，但他谴责学术性的研究是搞无用的学问。罗伯逊不懂德文而撰写《查理五世传》。在这个世纪有些最受欢迎的著作，如席勒关于三十年战争的著述，却是学识浅薄，判断力不强的产品。

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在它对待宗教观念和中世纪问题上，最为明显。那时，关于希腊与罗马的知识相当普遍，部分原因在于受过教育的阶级熟悉古典文学，同时也是因为古代世界的观念与制度给改革家提供了启示。但中世纪却象天书一样难以理解，这不仅对于自然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是这样，对于三位一体论者也是这样。而且，无论是信仰者还是怀疑者，都不喜欢“热情”。休谟根本无视盎格鲁—撒克逊世纪，即形成英国的时代，认为那只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伏尔泰认为，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象研究

巴斯卡认为单靠科学不能找到最后的真理，不相信理性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强调人类心灵具有理性所不具备的理性，只有心灵可以感知上帝。——谭注

参阅海姆的巨著，两卷本的名人传记，（1877—1885年）。——原注

伯克，E.（1727—1797年），英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思想家。他强调历史运动的延续性、渐进性和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和1789年革命，赞美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光荣革命”，同情北美独立和波兰、印度的民族斗争。他的思想对西方史学和政治学的发展均有影响。——谭注

参阅迈内克的杰作：《历史主义的兴起》，两卷（1936年）和迪尔泰的《文集》第三卷中《18世纪与史学界》一文。——原注

波林勃洛克，H.St.J.（1678—1751年），英国王党政治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具有直接的实用价值，近现代史更能为政治家和公民服务，而博学派的校勘考订工作，只不过是好古兴趣的表现。——谭注

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他在其《〔奥尔良〕姑娘》里暴露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不理解。罗伯逊的著名的《查理五世传》导言则沾有愚昧的轻蔑态度的污点。吉本轻视宗教情感和信仰，所以他在漫长的历程中看不到许多最重要的人和事的意义。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表明了罗马帝国是怎样生存下去的，但关于罗马帝国在其中继续残存着的那个新世界，他和其他的人一样，都懂得很少。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末期，对中世纪的同情才随着浪漫主义运动象潮水般地涌现出来。

第二个缺点是，对待权威作者和他们提供的史料方面缺少批判能力。关于法国的几部历史都是以详述法拉蒙德的故事作为开篇的；罗兰写的历史则是重写了李维的著作。在约翰内斯·缪勒看来，所有编年史和典章，只要是古老的，都是一样地有价值；他的出名，主要因为他生动地译述了楚迪的爱国故事。只要怀疑主义存在，它往往是和轻信一样地毫无批判。拉莫特在他关于历史不确定性的《论文》里说，聪明人除了神示的真理外，什么也不相信。培尔既是理性的敌人，也是信仰的敌人。饱学的耶稣会徒哈杜因甚至认为古代世界的历史是13世纪的修道士编造出来的，他们是修昔底德、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的真正作者。尽管有了马比荣，但研究方法还处在童蒙阶段。

历史研究没有重大进步的第三个原因，是几乎不存在历史教学。的确，历史已被承认是统治者的必要教育。博絮埃说：历史是君主的顾问官，并为了教导王子们而编写了《世界史》。费纳隆也为勃艮第公爵撰写了《查理大帝》。而《列强史》则是专门为了年轻的约瑟夫二世编写的。但另一方面，在法王亨利四世批准的巴黎大学规程里，却没有提及历史课程；在耶稣会徒（他们是半个欧洲的教师）的课程表里，也没有历史课程。费纳隆在其《女子教育概论》一书内，也不给历史课程任何地位。笛卡儿派藐视历史，马勒伯朗士声称，形而上学中的一项原则所包含的真理就比一切历史书所包含的真理还多。儿童不得不在不知历史为何物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曾偶然引起过抗议。费勒里表示他希望每个人都应知道他的城市和省份的历史。罗兰

法拉蒙德（Pharamond），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是法兰克人墨洛温朝的第一个国王。——译者

罗兰，C.（1661—1741年），法国史学家。——谭注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大史学家，著有《罗马史》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余卷。——谭注

楚迪（Tschudi，Aegidius，1505—1572年），瑞士历史家，被称为“瑞士史学之父”。著有《瑞士编年史》，但其中很多材料不正确，甚至是伪造的。——译者

拉莫特（leVayer，1588—1672年），法国作家、哲学家。——谭注

哈杜因，J.（1646—1729年），法国史学家，著有《古典批判导论》，怀疑古希腊罗马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对后代颇有影响。——谭注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05年），古希腊卓越的史学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反映了作者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批判态度，是后世西方史学家学习的典范。——谭注

费纳隆，M.（1651—1715年），法国神学家、作家。1689年受任为路易十四之孙路易（勃艮第公爵）之傅，编写历史、寓言、小说作为教材。——谭注

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法国怀疑派哲学家。——谭注

费勒里，A.H.（1653—1743年），法国枢机主教、政治家、历史家，著有《教会史》共二十卷、《论历史》等。——谭注

慨叹说，在学校中竟没有安排讲授法国史的时间，而“不知道历史，是每个善良的法国人的耻辱，”他还说，他觉得自己虽然身在祖国，却象一个外国人一样。达朗贝尔声称，儿童在离开学校时对祖国的历史茫然无知，是一件丑事。当然，也有少数个别的人，曾试图传授历史知识。英王乔治一世曾在〔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内设立近代史讲座，但教授们，包括诗人格雷在内，很少讲课或从来不讲。在法国，直到1769年法国学院设立历史和伦理学讲座后，才承认了历史课有权同较老的科学处于平等地位。德意志的青年在历史教学方面，情况较好，1757年戈丁根大学创立后，高级历史课程开始设立，并由公认为有资格的学者担任教授；关于这批学者的影响，将在下文叙述。

第四个缺点是，在利用文献与宣布研究结果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旅行的费用和 risk 已给研究者在查阅所需要的资料上造成困难，而由于档案所有人似守财奴般地不愿以其宝藏示人，他的困难就更大了。手稿被认为是对于决定法律和先例的实际问题有用的。1729年在东弗里斯兰，有一个档案管理员在接受委派的时候，他的雇主告诉他说，“在知道了我们家族的秘密之后，必须把它们带进坟墓里去，不得向任何人泄漏。”斯图加特的档案是任何人不能使用的，除非得到公爵的特许。“宫廷史官”的头衔具有一个真正的意义，那就是，领有这个头衔的人是王朝的光荣与尊严的保护人。正是在这种精神下，普芬多夫受命编写《大选侯传》；莱布尼茨受命研究布伦斯威克家族的起源。当穆拉托里为编纂《作家集》而搜集资料的时候，有几位意大利王公曾拒绝他查阅他们的档案，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的领土权利的论据。而且偶一失足，就可能毁掉一个人一生的事业。例如，詹姆斯派的卡特在一个附注内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疬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于是，伦敦市参议会授给他的补助金被撤消，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了。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而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丹尼尔神父受到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在著作中不提法拉蒙德及其它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即一般所称法国的最初四王，而修道院长维里却认为有必要把他们重新捧上王位。在奥地利，书报检查制度在玛丽亚·特蕾莎长期统治时期执行得特别严厉，外国书籍几乎全部禁止进口。在皇帝约瑟夫继他母亲登位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开明时期，但在他逝世后，蒙昧主义又捲土重来了。

历史家除了从世俗检查制度中遇到危险外，还会在天主教国家里遇到教会的强权。《禁书目录》和宗教裁判所产生了僵化作用，这在思想和科学的领域内虽然感受得最为直接，但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同样也是危害极大的。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也不能使人免受指控和定罪；甚至穆拉托里也只有在他的朋友，教皇本尼迪特十四的干涉下，才得到解救。要想认清检查制度所起的窒息作用，那就必须记住：由于害怕惩罚而没有写出来的著作同遭到检查制度扼杀的著作，可能同样的多。这样看来，让人们能够既勇敢又公正地

达朗贝尔，（1717—1783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曾任《百科全书》主编。——谭注

此书全名为《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意大利历史家》共二十八卷，系一巨型文献汇编。在西方史学界享有盛誉。——谭注

关于瘰疬症（King's evil），过去在英国曾传说该症可由帝王手抚而治愈。——谭注

说出真实情况的条件是少有的，而了解真实情况的意愿和发现真实情况所需的关键性设备也同样罕见。至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不同时代的深入观察以及历史科学所依靠的公正气质，那还有待于 19 世纪——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时代——初期北德意志的伟大学者的努力。

第二章

尼布尔

近代史学史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是尼布尔，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他的崇高人格成为后一代伟大历史家的典范或鼓舞力量。对于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他的父亲给予了最早的和最深刻的影响。老尼布尔是一位大旅行家，也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他被选派参加丹麦国王派遣的考察队以后，他以少有的毅力学习语言并研究古代东方的历史。他先在埃及呆了一年，然后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作了长期逗留，以后又游历印度，从那里经波斯、巴格达和巴勒斯坦回国。在他的独生子诞生前后的几年中，他整理并出版了他的游记。他渊博和精确的学识和他对未知或陌生地区的知识，使他的巨著立即获得了成功，传遍欧洲的每个国家。当巴托尔德〔尼布尔〕在18世纪最后一年住在英国的时候，他很高兴地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他决心要成为无愧其父的人。

这位罗马史学家撰写的他父亲卡斯頓·尼布尔的略传，有助于了解他自己的青年生活和早期学习情况。“他教导我们学习地理和历史、法文、英文和数学，并帮助我学习拉丁文。当我阅读恺撒的著作时，他就把当维尔的古代的高卢地图摊在书桌上；而我必须找出每个地方。”儿子临睡前坐在他膝上的时候，他经常给他讲东方的故事，不讲神怪小说。因此孩子很快就熟悉了穆罕默德、早期哈里发、伊斯兰教的传布和土耳其人的崛起，十岁的时候就写了关于非洲历史地理的文章。这同穆勒《自传》里人们熟知的情景非常相似。两位父亲都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就成功地灌输了大量知识，使他们比别的孩子早十年进入智慧上的成年时期。所不同的是尼布尔没有经历一场强烈的情感危机。这位历史家虽然和那位哲学家同样是少年老成，但他的青年时代是安宁而愉快的。尼布尔的近邻博伊厄，他是戈丁根诗社的成员，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朋友。巴托尔德〔尼布尔〕后来感激地提到这个人说，“他指引给我很多东西；要不然，也许在长时期内，我会一无所知的。”博伊厄也描写过巴托尔德十五岁时的情景，说他忙于在哥本哈根图书馆内翻阅瓦罗的手抄本，说他除了手抄本和不同的抄本外，什么也不想望了。十六岁时，他已是“一个知识广博和智慧成熟的小神童。他必然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二十岁时，他“已具有伟人的气魄。”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沃斯，即荷马诗

《尼布尔的生活与书信》（英文版，1853年）是最生动的传记之一。克拉森著《尼布尔》是一部最好的简传（1876年出版）。埃森哈特著《尼布尔传》（1886年）；利贝尔著《关于尼布尔的回忆》（1835年）；《全德名人传记集》所载尼森的文章以及奥托·梅耶尔的讲稿（见他的《传记集》，1886年）都是重要作品。尼布尔《通讯集》新版，由格哈特和诺尔文主编，共二卷于1926—1929年出版。关于近代德国历史学的最好概述有：贝洛的《解放战争以来的德国历史学》（1924年）；阿克顿的《德国历史学派》（载于他所著《历史研究》）和斯尔比克所著《从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直至今日的精神与历史》（1950年）。——原注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J.S.穆勒（1806—1873年），自幼年迄于成人，由其父经济学家詹姆斯亲自教育，督促至严，使其思想观点与方法深受约束。入社会后，他接触各种思潮，耳目一新，小穆勒感到自己头脑中发生了“精神上的危机”，从此，逐渐转变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激进派哲学家。——谭注

瓦罗（公元前116—127年），罗马古文物学家，编著有《论拉丁语》，《罗马古文物》等。——谭注

篇的译者。沃斯的《奥德赛》于1781年出版，而在1782年，他就写道，尼布尔家的孩子们除了奥德赛和珀涅罗珀外，别的什么也不谈。卡斯頓所欣赏的唯一诗篇是荷马诗篇，他的儿子对之也同样的热衷。尼布尔后来写道，在理解古代这一学科中，沃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因为他把古代人物当作同时代人物那样来解释他们，说明他们。

卡斯頓希望儿子继续地理考察工作，但母亲反对，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尼布尔对此也从无兴趣。后来，父亲决定要他成为外交家。然而，孩子很快即意识到他应作的工作是什么。十九岁时，他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如果我的名字得以流传下去，它将作为历史家与政治家，作为古典学家与语言学家而流传下去。”在基尔大学，他学习哲学、法律和历史，他对罗马的财产制度发生了兴趣。在后来几年中，他利用余暇研究古代世界的问题。尼科洛维在1797年认识了他，后来写道，“我从未见过象他这样有才干和勤奋的人。他的心灵象蜜蜂一样，它吸取我们这个丰盛时代的一切精华而不接触毒液。”在他一举成名之前，他已赢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这位攻读历史的学生后来变成历史学家，是由于一系列的外部事件。根据他朋友本生的说法，“尼布尔的生活比当代其它大作家都更加密切地同当时受苦人类的最深刻的运动和挣扎联系在一起。”在离开大学后，他充任丹麦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二十三岁时，他在英国进行长期考察，旨在进一步扩大他关于行政管理知识，而这次考察使他获得了对英国历史和状况的深刻了解，使得后来在他晚年访问他的人惊异不止。回到丹麦后，他参加政府工作，在六年之中一直协助指导丹麦的财政和商业政策，特别是关于丹麦殖民地的银行业务和商业。他的声誉传到了柏林，人们敦促他调换职务——当时正值普鲁士王国于耶拿战役中崩溃的前几星期。尼布尔的父母都是德意志籍，所以他接受了这项邀请。在其后的四年中，他致力于复兴普鲁士的财政。哈登贝格、施坦因和普王都认为他的工作具有极高的价值。一度传说他政绩不佳，但在有关他的辞职的文件公布以后，这种传说也就消散了。

法国革命一开始，尼布尔就从法国报刊上注意它的发展。他自始至终对革命抱着不信任和厌恶的态度，而沃斯及其他朋友则热情地欢迎它。大约三十年以后，他声称：“卢梭是我青年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崇拜的人物，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广大群众起初是赞成法国革命的。”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对激烈的变革表现出恐惧心理，这种心理，纠缠了他一生，并加速了他的死亡。他深知旧制度的各种弊病；而且在汉堡他个人认识了一些法国“逃亡者”，对这批人他始终怀着轻蔑的心情。他的理想，是按照法定程序的有秩序的发展。当法国革命所激起的力量被束缚于拿破仑的战车上时，他对法国革命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变成了对它的憎恨，同施坦因和费希特的憎恨情绪一样地激烈；而他对德意志的热爱发展成了要它为它服务的热烈愿望。由于他熟悉英国，所以他对法国革命的方法更加厌恶。在晚年，他向本土推荐过

沃斯，J.H.（1751—1826年），德意志古典研究家，译有荷马、维吉尔等古代诗人诗篇。——谭注
珀涅罗珀（Penelope），奥德赛的妻子、其夫出外多年而守贞不二。——译者

哈登贝格，K.A.V.（1750—1822年），普鲁士政治家，继斯泰因之后主持了一些限制封建法权的改革。——谭注

费希特，J.G.（1702—1814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于1807—1808年间多次讲演，鼓舞德意志民族意识，号召团结自卫。——谭注

伯克的政治哲学。他在罗马同利贝尔谈话时，时常提到：如果他未曾研究过英国，他永远不会理解罗马的历史。他写道：“1688年以来，英国的宪法和自由制度日臻完善，提供了历史上仅见的关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道德的最崇高图景。任何一种制度都没有更动或撤消，人们就逐渐在全国享有了自由——是在各个方面的最大自由，是任何民族所没有享受过的最大自由。在法国革命时期，也许没有一块地方比英国的处境更好。它是世界的骄傲，是举世羡慕的地方。”他不大相信某种特殊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他在为芬克的《英国制度论》所写的序言里表示，他深信英国的自由主要依托于行政制度而不是宪法。他没有看到乔治三世统治下的阴暗面，但他懂得了以行政分权制作为广阔基础的强有力中央政府的价值。

尼布尔以他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从事他一生的伟大事业。在丹麦政府服务时，他利用很少的余暇已编写了有关古代世界的几篇专著；辞职以后，他决心致力于罗马史的研究。那时，新建立的柏林大学是那些希望重建普鲁士的破碎河山的人们荟萃之地。可是没有人比尼布尔更加拥护普王的著名宣言“我们必须以智力来弥补物力的损失”。他要通过写作“使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他们能够肩负大任，并要给他们提供古代的崇高榜样”。人们劝他讲课；1810年他开始讲授了日后成为《罗马史》的课程。因为缺少讲演经验，他诵读讲稿；结果颇为成功。他的深厚的热诚，加上当时那鼓舞着新大学的求知热情和在解放战争临近时震动整个普鲁士的激昂情绪，使他的讲课吸引了大批著名的听众。

尼布尔同他的听众一样，对于所讲的课程深感兴趣；后来他回顾这三年的授课时间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萨维尼对他说，他开创了研究罗马史的一个新纪元，这不是对朋友的谀词。尼布尔相信历史研究中蕴含着伦理意义和对爱国精神的激励；这一点，是前人所未道及的。他觉得自己象费希特在其《告德意志国民书》里那样，直接在向他的同胞讲话。他后来向利贝尔说，“普鲁士蒙受耻辱的不幸时期对我编写的历史有一定影响。那时，我们只能热切期待局势好转，并为它作好准备，此外别无他途。所以我回过头来讲述一个伟大古国的历史，借此加强我和听众的意志。我们和塔西佗有着同样的情感”。他讲授了三组课程，其中头两组讲的是罗马的历史，第三组讲的是罗马古文物。这时，由于1813年全国奋起，他的听众大部分都驰赴战场了。在授课期间，他曾把前两组讲稿编成专书，分为两卷，在1811—1812年出版，并题词献给普王。这一部书虽然在几年后几乎全部重写，但它的出版却开始了一个系统地研究罗马的时代。

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罗马帝王时期和共和时期的研究，已经适当地进行，但很少有人企图就它的国家生活或它的成长过程试图形成明晰而连贯的概念。马基雅维里曾把李维的著作，把他自己的政治感想与格言依托。孟德斯鸠作了大胆的尝试，要发现罗马盛衰的原因，但他的知识浅薄，而且受到资料方面的限制。无数作家曾抄袭并节录李维的著作，但在尼布尔之前，没有人曾把罗马首先作为一个大国来研究。它的制度，无论政治的、法律的和经

参阅伦茨：《柏林腓特烈·威廉王家大学史》，卷 ，1910年。——原注

书名《罗马史》。——谭注

马基雅维里精研李维著作，撰有《论提图斯·李维前十书》。——谭注

孟德斯鸠著有《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1734年）。——谭注